

史学思想与区域历史论丛

——徐国利学术文集

徐国利◎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入学思想与区域历史论丛

— 徐国利学术文集

徐国利◎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思想与区域历史论丛:徐国利学术文集/徐国利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1
(安徽大学历史学文库)
ISBN 978-7-5664-0884-6
I. ①史… II. ①徐…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5944 号

史学思想与区域历史论丛——徐国利学术文集

ShiXue SiXiang Yu QuYu LiShi LunCong——XuGuoLi XueShu WenJi

徐国利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21
字 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80 元

ISBN 978-7-5664-0884-6

策划编辑: 鲍家全
责任编辑: 胡心怡 张 锐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李 军 金伶俐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自序

ZIXU

这本学术文集收录了我 2000 年以来发表的 20 篇论文,最早的一篇是《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4 期;最晚的一篇是《安徽历史文化特点及其成因的再探讨》,发表于《理论建设》2015 年第 1 期。

这些论文是从公开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筛选出来的,旨在反映我学术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其中包括与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二是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主要是安徽,特别是徽州历史文化研究。在这些领域外,我发表的其他论文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考虑到与这两个主题关系不够密切且本书篇幅有限,故未加收录。如,引用率较高的《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2 期)一文;转载率较高的关于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两篇论文:《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学术研究》2005 年第 6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5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5 年 9 月“篇目辑览”收录),《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3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7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此外,发表在港台及海外学术期刊和论文集集中的论文,如《钱穆先生“守旧开新”学术思想和文化复兴论》(台湾《鹅



湖》2010年第10期)等也未加收录。

收入学术文集的论文不仅涵盖了我学术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也大体反映了我走上学术道路后的研究历程,即:从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开始,逐步扩展到安徽区域史和徽学(即以明清及近代为中心的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1990年,我从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学校的马列室从事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这期间虽然从事了一些科研,但是受制于各种内外因素,学术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成果很少。为此,我决定考博士,以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水平。1997年至2000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所,师从著名史学理论家蒋大椿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学”的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论文《钱穆史学思想研究》,并于2004年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攻读历史学博士,使我真正走上了学术道路。博士毕业后,我回到母校。2002年,我转到历史系从事教研工作,这使我能全身心地投入专业学术研究中。我发表的近百篇学术论文中,90%是这一时期的成果;学术专著等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回顾自己这25年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前10年基本是自学和摸索阶段,后15年才真正步入学术殿堂。

我天资不高,在学习上往往要比聪明人多花费许多倍的时间,这一点从我入小学读书时起就一直如此。不过,我能吃苦,学习勤奋,这弥补了我天资的不足。我在求学小传《“韧”的追求》(收入栾贵川主编的《博士生谈自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将自己的求学心得和经验总结为“勤能补拙”。好在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来说,天资不是最重要的,钱穆等许多国学大师都说过,研究史学不需要很高的“天分”,但一定要“勤奋”。不仅勤奋刻苦,我兴趣点也广泛,对于各门类的知识都渴望了解和掌握,这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培养了我多元的思维方式。我特别喜欢思考理论和哲学问题,尤其是那些关乎历史和大人生大问题和大道理,总想得出一个“究竟”。虽然,这种大问题和大道理太深奥,往往思考不出答案;然而,20多年的治学却使我愈益深切地感受和体悟到理论研习和哲学思辨对于文史专业研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2000年博士毕业回母校后的15年,我逐步踏入了史学研究的学术殿堂。与现在的许多青年学术新锐相比,当时年近35岁的我已经算是学术“晚成”之人。在这15年的学术道路上,我坚持“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领域,即历史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同时亦有所扩展,即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在这期间,我有幸参与了著名史学史家瞿林东先生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撰写了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下卷的两章。其间,我还在安徽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博士点担任导师,开始关注和研究现代新儒家的历史哲学,指导4名学生分别撰写了关于中国现代著名新儒家,即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的历史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评审专家的一致肯定。另一方面,我借助安徽大学史学研究中的优势学科,即徽学和安徽区域史,逐步投身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我先是参与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整理”的工作,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作了3年多的新发现徽州文书的整理。该项目的主要成果就是由刘伯山研究员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4辑大型徽州文书影印资料集《徽州文书》。2007年,我主持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传统职业变迁与明清徽州人口流动研究”,该项目已经顺利结项。此外,我对安徽区域史也作了一些研究。收入本书的论文大体是我这一时期在以上两个研究领域的成果。

我之所以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学术研究之路,投身安徽区域史和徽学的研究,首先是因为安徽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的“211工程”大学,有良好的科研基础和地域学科优势;安徽省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有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广阔的学术空间。再者,我是土生土长的徽州人,对安徽历史文化,特别是徽州历史文化不仅有着学术的认同,还有着情感的体验,研究安徽历史文化,特别是徽州历史文化,亦可谓是一种学术体认和乡情升华。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研究取向是符合史学研究的学术本质和规律的内在要求的。我的博士



生导师蒋大椿先生多次和我说起过,研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人,还是要作具体的历史实证研究,这样才能在史学实证研究中发挥史学理论研究的理论思维优势和方法论意识,同时又不至于使史学理论研究流于空泛,从而使两种研究相得益彰。通过 10 多年的学术研究,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并且力求将这种体会和经验落实到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去。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和进展,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着力借鉴其他学科如区域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以之研究历史,极大丰富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为历史学开拓诸多新视野;二是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西方的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海外中国学等诸多学派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模式,开辟区域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口述史、妇女史等诸多新的研究领域,提出大量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但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重实证、轻理论的倾向,“让史料说话”成为不少学者的座右铭;二是即使在重理论和方法方面,往往是对国外理论方法采取“拿来主义”的多,融合创新为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少。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学者没有能够正确看待理论思考、哲学思辨与实证考辨、史学研究的辩证关系,往往将两者视为没有关联的学科,甚至是对立的学科。而中国当代史学要取得突破性发展,要在国际史学界树立中国的话语权和建构有中国气派的史学范式,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人文学科的发展史,尤其是中西史学发展史清楚地昭示了这一道理。纵观古今中外的史学史,凡为史学大师者无不具有哲学思辨的思想,其著述无不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哲学内涵。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这种趋势和倾向更为明显。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史上,近代史家梁启超、章太炎和康有为等不用说,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和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钱穆、柳诒徵等亦不用说,即便是备受当代中国史学界推崇的实证派史家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和陈垣等无不是有着良好的理论修养和深厚的哲学造诣,王国维更是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先驱之一,而胡适倡导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则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史学界 20 多年。在



西方现当代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些史学流派,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等亦是追求史学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流派,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其几代大师均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上成就斐然。

收录入本书的论文有两篇系与研究生合撰,即:《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与朱春龙合撰)、《近代徽州与安庆地区文化人物的结构特征及其成因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与林家虎合撰)。自2003年从事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工作以来,我特别重视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论文写作能力的训练,对于一些有学术才质和写作能力的研究生,或是结合他们的毕业论文,或是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与他们商量论文选题,进而合撰论文,通过对撰写论文的反复修改来提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与研究生合撰论文20余篇,先后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学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河北学刊》、《江淮论坛》、《齐鲁学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和《历史文献研究》等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我觉得这是自己培养研究生走上学术道路的一个成功经验。我的硕士研究生大多考上了国内知名大学的博士生,有些已成为一些大学的青年学术骨干。

回顾和总结走过的学术道路,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仍是初入学术殿堂的学人。收录进本书的20篇论文水平有限,只能说是对自己20多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我的学术研究领域,拙著的“附录”收录了我从事学术研究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或编撰的学术著述。衷心祈望拙著的出版,能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和雅正。

史海无涯,书山有路。我将会在学术求索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徐国利

2014年12月

目录

MULU

上篇 历史文化观与史家思想

- 3 |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发展及其特征
- 11 |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 17 | 程朱理学的“圣王”君主论
——以二程和朱熹思想为代表
- 32 |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论风俗、教化和国运兴衰
- 45 | 孙中山民本史观的道德价值取向初探
- 62 | 陈独秀“伦理革命”思想的再认识
——兼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目标和中心内容
- 74 | 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
——对梁启超“新史学”的再认识
- 88 | 胡适史学思想的再认识
- 111 |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
——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 128 | 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下篇 区域史与徽学研究

- 147 | 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
- 163 | 安徽历史文化特点及其成因的再探讨
- 175 | 清代中叶安徽省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危害
- 185 | 近代徽州与安庆地区文化人物的结构特征及其成因比较研究
- 201 | 传统与现代二元教育和安徽现代文化名人的成长
——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例
- 218 | 当代中国的徽州文书研究
- 238 | 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与明清徽商伦理思想的转换和建构
- 255 | 朱子的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
- 279 | 明清徽州新儒贾观内涵与核心价值取向的再探讨
- 296 | 民国时期基层社会传统职业观的革新与保守
——以民国徽州家谱的族规家训所见职业观为例
- 314 | 附录 主要学术论文和学术著述
- 323 | 后记

上篇

历史文化观与史家思想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发展及其特征



国家起源问题是国家观中的重要问题,“国家的定义和起源问题是所有国家观的基础,它直接影响到从哪个角度去认识国家的本质”^①。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和史学家对国家起源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和富有启示意义的阐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起源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确立时期。关于中国的国家起源,一般认为在夏代已经形成了国家。有了国家,就会有国家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有了系统的国家思想。殷周鼎革的重大意义之一是,周代确立了新的文化,“天(帝)”虽被奉为至上神,但自然性和人格神的色彩被淡化,它被赋予了“德”的品格和意义,成为一种道德理性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同时,统治者能够获得国家权力来统治“民”,既在于天赋予其“德”,也在于民众对其德的认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②。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轻天命重人事、重君王之“德”和民本的人文道德理性精神获得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等成为先秦诸子思考的重要对象。其中,儒家的孟

① 王振海:《关于国家起源、本质与特性的再思考》,载《文史哲》,1999年第3期。

②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周书·蔡仲之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子和荀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和韩非及一些杂家等从各自政治立场和历史观出发,对国家起源说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如墨子的“除乱尚同”说、法家的“止争息乱”说、儒家孟子的“辟除民害”和“与民教化”说、荀子的“止争息乱”说、《吕氏春秋》提出的“以兵止争”说等。此外,老子对国家起源问题的回答也颇具特色。先秦诸子的国家起源论丰富多彩,为此后国家起源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和法家的影响更为深远。

秦汉至隋唐时期,国家起源论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正统国家起源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后来政治统治的正统思想。董仲舒以儒家公羊学为本,糅合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一些思想,建立起“天人相与”和“天人感应”的神学化儒学,以此来解释社会历史与国家政治的兴衰。他认为,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国家和社会秩序确立的本原,为此,他提出了“尊天受命”的政治观和纲常伦理观,宣扬“君权神授”和“符命”论的神权政治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①。东汉汉章帝时,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董仲舒的神学化经学被《白虎通》一书系统化,它和封建纲常教义相糅合,成为东汉的统治思想。“君权神授”和符命论被强化,“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②。“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③。这种“君权神授”论及国家起源论是班固撰写《汉书》的指导思想。二是一些思想家和史学家结合道家、法家和先秦儒家有关国家起源的思想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唯物思想,对正统的国家起源论加以批判。其中,既有东晋鲍敬言以老庄思想为指导所撰写的《无君论》等,也有唐代柳宗元、杜佑等从唯物思想方面作的批判和阐述。特别是柳宗元的《贞符》和《封建论》从唯物主义和儒家道德理性立场出发,有力地批判了“君权神授”和“符命”论,深刻阐述了国家的形成是客观的历史发展

① (汉)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② (汉)班固:《白虎通》卷一《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③ (汉)班固:《白虎通》卷一《封公侯》。



过程,达到了当时国家起源论发展的高峰。

宋元明清时期,国家起源论得到丰富和新发展。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同时,社会却趋向宗族化和平民化;在经济上,自耕农经济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繁荣;在文化思想上,儒家思想经过与佛道思想的长期斗争与融合,最终形成宋明理学,并成为朝廷的统治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使思想家和史学家对国家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一方面,由于君主专制不断被强化,以“君权神授”和符命说为指导来阐述国家起源问题的思想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不少思想家和史学家根据社会历史的新发展,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国家起源进行总结或是作出新的理论回答。如,宋代司马光继承历史上的“除乱禁暴”和“圣人创化”说,论述了“礼”和“德”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对国家起源作了更加具体和丰富的阐述。宋明理学家则从性善论出发,强调“德”在君王合法性上的决定作用,主张“圣王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对“君权神授”作了理论消解,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君主与国家起源的问题。这一时期有关国家起源探讨的最重要成果,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结合君主专制批判,对国家起源作出的富有近代启蒙色彩的阐述。他们从自然主义人性论出发探讨君主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对性善论的圣王君主论加以否定,肯定民在国家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开辟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研究的新方向,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研究推向顶峰,为中国近代国家起源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综观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发展及其思想内容,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突出特征。

第一,多元共生,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所谓多元共生,是指先秦诸子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了多种形态的国家起源论。墨子主张“除乱尚同”说,认为原初民始生之时,人各持己义,“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

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①。就是说，天选立天子和各级官吏，建立国家制度，是为了统一人的思想，以消除天下之乱，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家商鞅提出“止争息乱”说，认为国家起源于上古民因私而争；至中古，贤者以仁爱施政，然而民众无制；至近古，圣人顺应社会发展，“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国家便建立起来了。由于人性恶，因此，以法治国是立国之本，“古者民聚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②。他认为，从崇尚仁爱的中古到以法立国治国的近世国家是历史的进步。这种思想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继承和发展。儒家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的形成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是，因对人性善恶认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国家起源论。孟子主张“辟除民害”和“与民教化”说，谓尧舜禹的时代洪水泛滥，禽兽逼人，民不知稼穡和人伦，古代圣人分别为民辟除灾害，教民稼穡和礼仪人伦，使民能饱食暖衣和逸居有教，由此形成了君主和国家；而人民所以拥戴圣人为君主在于他们道德高尚，“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③。荀子则提出“止争息乱”说，认为：“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④这种观点与法家有相通之处，两者均立足于人性恶，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为了“止争息乱”。但是，与法家不同的是，荀子认为国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礼义而非刑法是国家的本质与工具。老子主张“自然生成”说，认为国家与天地自然一样都是道的产物，而非天或神的产物，“道生一，

① 谭家健、孙中原注译：《墨子今注今译》，《尚同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②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开塞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④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性恶篇第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①；“（道）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②。但是，他反对国家的发展，主张返回原初的“小国寡民”社会，这是退化的国家观。杂家《吕氏春秋》主张“以兵止争”说，认为立君以义兵禁争止乱是建立国家的目的所在，因为，民天性好争斗，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③。由上可见，先秦诸子的国家起源论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当代国家起源论的主流观点主要有冲突论、融合论。冲突论认为，国家是因社会成员经济的分化和社会内部冲突而形成的，国家是暴力镇压的工具。融合论认为，国家是为了协调和稳定社会阶层和部门而产生的，统治者的确立是在于其才能和品质，能给民众带来利益，被人民信任。^④ 以此来看，先秦诸子的国家起源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大多属于冲突论，而孟子的思想则属于融合论。这是异中有同。所谓同中有异，如儒家的荀子和孟子都认为国家的起源是为了建立天下大治和道德完善的社会，然而他们对国家起源的人性论依据、过程和本质却有着根本不同的认识。

第二，一元主导，多途发展，兼容并蓄。所谓一元主导，是指从中国古代史的长时段和总体看，儒家以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为价值取向、强调圣贤的地位和作用的国家起源论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西汉独尊儒学、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指导思想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后，儒家的国家起源论则占据了统治地位。所谓多途发展，是指虽然儒家国家起源论一统天下，但其内部却形成了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国家起源论。一是以“君权神授”和“符命”论为指导的国家起源论，而班固以之为指导撰写《汉书》首开先河。他认为君权天授，礼和刑等国家机器和制度的形成是圣人因“天秩”和“天讨”的产物，“《洪范》

① 《老子》四二章，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② 《老子》二八章。

③ 《吕氏春秋·淮南子》，《孟秋纪第七·荡兵》，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④ 参见[美]乔纳森·哈斯著，罗林平、罗海纲等译：《史前国家的演进》，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